

## 关于《后西游记》研究的几点思考

赵兴勤

(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, 江苏徐州 221116)

**[摘要]** 《后西游记》是《西游记》后较有影响的一部神魔小说,一般认为其产生于“明末清初”。然而,根据该书的最早刊本、题款、内容以及《在园杂志》《书隐丛说》等文献透露的信息,这部小说的成书,不会早于康熙初年,不会晚于康熙中叶。《后西游记》将《西游记》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故事,改为唐大颠带领孙小圣诸人往西天取真解,且多次叙及真经在而无真解之事,看似随意杜撰,其实包蕴进一段明清之际学术思想演变的丰富内容。首先,取法程朱、表章六经,乃元代以来的学术指向。其次,思想界纷争时起,莫衷一是,学术发展亟须寻找新的出路。三是学风浮躁,辄相模仿,而不能相互发明,激使学人“寻流溯源,推求古经本旨”,以“真解”廓清“异说”。《后西游记》中虚构出的阴阳二气山与“造化小儿”,所透现的乃是生当明清之际的读书人对现实人生的感喟与困惑,具有深刻的寓言性。

**[关键词]** 《后西游记》; 年代; 哲学; 寓言小说

**[中图分类号]** I207.424 **[文献标识码]** A **[文章编号]** 1671-1696(2018)04-0001-07

《后西游记》是《西游记》后较有影响的一部神魔小说,以其思想意蕴丰富、情节构思巧妙、语言轻俏活泼,为人们所喜爱。然而,这样一部作品,却未能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,即使专门的断代小说史,也很少对其做专题论述,这难免令人有些遗憾。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者刘晓廉曾称:“《后西游记》是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寓言小说之一,它的重大意义一直被原作《西游记》的巨大成功所遮掩。自问世三百多年来,批评家从来没有看重它,只是囿于成见,把它当作二三流作家的劣质仿制品。……《后西游记》在象征文学上成功地讲述了一个意味深长而重大的故事,在文字表达上也体现了饶有兴趣和美味十足的艺术水平。”<sup>[1]</sup>笔者亦深有同感,现拟就有关《后西游记》研究的一些问题,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:

### 一、《后西游记》产生的年代

说起作者佚名、天花才子点评的《后西游记》,一般认为其产生于“明末清初”。然而,据我们所知,这部小说的最早刊本,似是乾隆四十八年

(1783)金闾书业堂《新刻批评绣像后西游记》本。此后,又有道光元年刻《新镌批评绣像后西游记》、务本堂刻《后西游记》、上海申报馆铅印《后西游记》、光绪二十一年上海书局石印《后西游记》。孝文堂、会元堂、上海锦章书局、上海章福记书局等,均曾刊印此书。但是,无论哪种刊本,均据“明末清初”相去甚远,时间落差较大,易令人生疑。

然而,尽管我们没有看到早于金闾书业堂的《后西游记》刊本,但是,并不是说此前无刊本。清康熙末年成书的《在园杂志》(刘廷玑著)卷三列有“续书”一目,中谓:

近来词客裨官家,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,即袭其名,著为后书副之,取其易行,竟成习套。有后以续前者,有后以证前者,甚有后与前绝不相类者,亦有狗尾续貂者。“四大奇书”,如《西游记》乃有《后西游记》《续西游记》,《后西游》虽不能媲美于前,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,若《续西游》则诚狗尾矣。<sup>[2]124-125</sup>  
首先,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记录者刘廷玑的生

**[收稿日期]** 2018-05-20

**[作者简介]** 赵兴勤,男,江苏沛县人,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硕士生导师。

平。刘廷玑其人,《八旗通志》卷二二九“人物志”有传,谓其曾任处州知府,“累升至江西按察使,缘事降淮扬道”<sup>[3]4395</sup>。但未载其生卒年。张慧剑《明清江苏文人年表》,谓刘廷玑康熙十七年(1678)曾与“常熟钱良择(玉友)读书北京无倦轩”<sup>[4]803</sup>。昆山人吕熊(文兆),康熙二十一年(1682)游幕北京,“与刘廷玑定交”<sup>[4]827</sup>。康熙二十五年(1686),廷玑为官于浙江台州,二十七年(1688)出任处州知府。至康熙四十年(1701),始改官江西学使。<sup>[2]191</sup>船至龙游,吕熊前来相会,述及拟作《女仙外史》之事,得到刘廷玑的大力支持,并承诺待书成,“当为付诸梓”<sup>[2]191</sup>。次年,吕至南昌,刘“为适馆授餐”<sup>[2]191</sup>,以使其专门著书。康熙四十二年(1703)冬,刘缘事削职北归,旅居清江浦。次年秋,吕到访,并以小说《女仙外史》稿本见示,廷玑建议其删除“淫褻语”<sup>[2]191</sup>,并为作品题语。康熙四十九年(1710),“廷玑以公务至徐州,作《彭城纪事》及《督賑》诗,述徐州此年灾况”<sup>4[965]</sup>。康熙五十四年(1715),《在园杂志》刊成,刘氏在该书自序中谓:“今值河工久庆安澜,得于退食余闲,焚香静坐,或与二三宾友,煮茗清谈,偶有记忆,辄书一纸投篋中,积渐成帙。”<sup>[2]1</sup>廷玑的“任事苏北河务”<sup>[4]954</sup>,是在康熙四十六年(1707)。也就是说,他接触《后西游记》这部小说,当在康熙中叶前后。而该小说的成书,不会早于康熙初年。

其次,《后西游记》题曰:“天花才子点评”。“天花藏主人”“天花才子”“素政堂主人”“天花主人”,在明清之际的小说题署中屡见。杨力生《关于烟水散人、天花藏主人及其他》一文,曾根据相关书录,梳理出各小说题有“天花藏主人”(或“素政堂主人”)字样者达十六种,其中《人间乐》,题“天花藏主人著”;《梁武帝西来演义》,题“天花藏主人新编”;《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》,题“天花藏主人编次”;《玉支玑小传》,题“天花藏主人述”,余皆有“天花藏主人”(或“素政堂主人”)所题之序。题“天花主人编次”的有两种,即《惊梦啼》《云仙啸》。而题曰“天花才子编辑”的则为《快心编》<sup>[5]326-327</sup>。

“天花藏主人”“天花主人”“天花才子”等,是否为一,学界有争议。孙楷第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》于《锦疑团》后谓:“天花藏主人不知何人,观《玉娇梨》序,似即《玉娇梨》作者。其序《平山冷燕》在顺治十五年,则明末清初人也。”<sup>[6]156</sup>所论距事实不远。戴不凡在《天花藏主人即嘉兴徐震》一

文中,则认定这位热心小说创作的文士,“先以‘天花主人’‘天花才子’,后以‘天花藏主人’为号,也是很自然的”<sup>[7]232</sup>。且此人即嘉兴徐震。检索杨廷福等编《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》,嘉兴人徐震,“字秋涛,号烟水照人、天花藏主人、烟水散人、复驾说斋”<sup>[8]458</sup>。若《索引》不谬,那么,《女才子书》(又名《闺秀佳话》《美人书》《情史续传》)自叙所题“鸳湖烟水散人”乃徐震,当无疑。又与钟斐《序》中所指称“徐子秋涛”“秋涛子之《女才子集》”相呼应。戴不凡之推论,还是有道理的。如此看来,“天花藏主人”“天花主人”“天花才子”“烟水散人”“素政堂主人”乃一人之化名,并非无案可稽。徐震其人,《两浙輶轩录》《两浙輶轩续录》等,皆无载述。但他生活于明末清初,既是小说家,又是小说营销的重要推手。其小说大都刊刻于顺、康之时。《后西游记》当然也应在这一时段成书。刘廷玑所看到的《后西游记》,当不会晚于康熙中叶。

再次,《后西游记》第二十四回叙及文字狱相关内容。所写之文明天王,握有“害人之笔”,惯以文字压人。那支笔,“摸着便小,及要拿起他来,就是生根一般,莫想动得一动”<sup>[9]261</sup>，“到了头上,就压得骨软筋酥,莫想撑支得起”<sup>[9]260</sup>。用金锭压人,“文笔压在金锭之上,就像砌宝塔的一般”<sup>[9]259</sup>。皆似有所喻指。清初,榷关滥设官吏,敲诈过往客商,“每官一出,必市马数十匹,招募书吏数十人。绍兴棍徒,谋充书吏,争竞钻营,未出都门,先行纳贿。户部又填给粮单,沿途骚扰,鞭打驿官,奴使村民,恶迹不可枚举。包揽经纪,任意需索,量船盘货,假公行私。沿河一带公然与劫夺无异,商贾恐惧不前,百物腾贵”<sup>[10]955</sup>。地方官吏中满族亲贵,多“不识文义”,“文移招详,全凭幕友代笔,转换上下,与吏役通同作弊,贻害百姓。督抚不行纠参,大乖法纪”<sup>[10]956-957</sup>。所谓“文笔”“金锭”压人,当影射此等现实。当然,言下所指,还不仅仅于此,作者还借此生发感慨道:“久知未造诗书孽,何得牵缠文字冤。”<sup>[9]260</sup>很显然,又是在影射清代文字狱。

据史载,清代文字狱最早者,当为庄廷鑑《明史》案。庄廷鑑乃浙江湖州富豪,知晓内阁大学士朱国桢著有《明史》,然《列朝诸臣传》尚未及付梓,遂花千金购得原稿,窜名己作刻之,“补崇祯一朝事,中多指斥清代语”<sup>[11]181</sup>,被人告发。“时廷鑑已死,戮其尸,诛其弟廷钺”<sup>[11]181</sup>。“江楚诸名士,列

名书中者皆死。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”<sup>[11]182</sup>。“是狱死者七十余人,妇女并给边”<sup>[11]182</sup>，“虽有冤者,不敢奏雪也”<sup>[11]182</sup>。此狱结案于康熙癸卯(二年,1663)五月,在当时形成很大影响。《后西游记》“何得牵缠文字冤”云云,当是有感而发。由此可以推定,该小说的创作时限,当在此案审结后的康熙中前叶。或与《麟儿报》等小说的创作时间相去不远。

还有,《后西游记》一书,在雍正初即已被戏曲家改编为剧作传世。戏曲研究家卢前,在其《读曲小识》中著录曰:“《阴阳二气山》,一名《后西游记》,一册。都四十七叶,叶十八行,行二十字,附注板眼。雍正二年甲辰,咏风堂沈氏精钞。不著撰人姓氏,共十二出。”<sup>[12]105</sup>并加按语曰:“此盖神仙教化剧也。以阴阳二气名山,以好胜名圈;虽隐喻点化,终伤庸腐,且结构平常,文词亦多不可取,聊足供场头热闹博噱笑之资而已。”<sup>[12]108</sup>该小说卢前或未尝寓目,故未言此剧是由小说改编而来。然而,戏曲家既然有意将其搬上氍毹,恰说明《后西游记》在当时产生一定的影响。由问世而广为流播自然需要一定的时间,再次证明《后西游记》小说的产生,不会晚于康熙中叶。

清人袁栋(1697—1761),字国柱,号漫恬,别署玉田仙史,江苏吴江人,乾隆间监生,著有杂剧《陶朱公》《郑虎臣》《鹤笼书生》等。其所撰《书隐丛说》卷五“胡僧呪术”条谓:

汉武帝信越巫,董仲舒数以为言。武帝欲验其道,令巫诅仲舒。仲舒朝服南面,诵咏经论,不能伤害,而巫者忽死。唐贞观中,西域胡僧有呪术,能生死人。傅奕曰:“此邪法也!臣闻邪不干正,若使呪臣,必不能行。”呪之,而奕不动,僧反自毙。推其理,呪术可驱恶气为厉,令人阻闭而死。□正不敌,其气必有所归,所以反而自毙耳!《后西游记》中用此事,亦甚明晓。<sup>[12]卷五</sup>

同书卷十八“罗刹夜叉”条亦谓:

《路史》曰:罗刹国在婆利东,与林邑为市。市必夜至,常掩其面,畏人见之。夜叉国在北海。李文公问药山禅师:“如何是黑风吹船舫,漂堕罗刹鬼国?”《后西游》鬼国夜市本此。<sup>[12]卷十八</sup>

该书有乾隆初年写刻本,亦可证《后西游记》之成书下限及在清代之流播影响。

## 二、“求真解”情节建构的学术背景

《后西游记》小说,由《西游记》唐僧师徒西天

取经故事改为唐大颠带领孙小圣诸人往西天求真解,且多次叙及真经在而无真解之事。第五回,借如来之口说:“我这三藏真经,义理微妙,一时愚蒙不识,必得真解,方有会悟,得免冤愆。可惜昔年传经时,因合藏数,时日迫促,不及令汝将真解一并流传,故以讹传讹,渐渐失真。”<sup>[9]52</sup>又一再称,唐天子“打点要出榜,招求真解之人”<sup>[9]73</sup>，“必要遣人求得真解来,方许解真经。”<sup>[9]87</sup>当别人问及讲经是否可以废止时,唐半偈径称:“讲经何可废,不得其解而讲则可废。”<sup>[9]100</sup>强调“真解”在理解经典本文中的重要性。当小行者述及自利和尚“借佛田名色,骗人布施”一事时,唐半偈又说:“佛教本自慈悲,被这些恶僧败坏,竟弄成一个坑人的法门了,此真解不可不速求也。”<sup>[9]123</sup>这则是从现实的角度,强调“求真解”的必要性。乍看起来,《后西游记》小说之情节是以“西游”为话题而随意杜撰“求真解”之情节。其实不然,它包蕴了一段明清之际学术思想演变的丰富内容。

首先,取法程朱、表章六经,乃元代以来的学术指向。当时,为学“专以周、程、朱子之说为主,定为国是,而曲学异说,悉罢黜之”<sup>[14]74</sup>。入明,朝廷开科取士,“专取四子书及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春秋》《礼记》五经命题试士”,“其文略仿宋经义,然代古人语气为之,体用排偶,谓之八股,通谓之制义”<sup>[15]1693</sup>。“初场试《四书》义三道、经义四道。《四书》主朱子《集注》,《易》主程《传》、朱子《本义》,《书》主蔡氏传及古注疏,《诗》主朱子《集传》,《春秋》主左氏、公羊、谷梁三传及胡安国、张洽传,《礼记》主古注疏。永乐间,颁《四书五经大全》,废注疏不用。其后,春秋亦不用张洽传,《礼记》止用陈澹《集说》。二场试论一道,判五道,诏、诰、表、内科一道。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”<sup>[15]1694</sup>。“如此一来,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《诗集传》《易本义》,程颐的《伊川易传》(又称《程氏易传》《周易程氏传》),胡安国的《春秋传》等,被法定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”<sup>[16]13-14</sup>。认为“《四书集注》《章句》《或问》,皆朱子萃群贤之言,议而折衷。以义理之权衡,至广至大,至精至密,发挥先圣贤之心,殆无余蕴。学者但当依朱子精思,熟读循序渐进之法,潜心体认,而力行之,自有所得”<sup>[17]卷一</sup>,以致形成“非朱子之传义,弗敢道也;以言《礼》,非朱子之家礼,弗敢行也”<sup>[18]卷三</sup>的一统局面。“他书一切不观”<sup>[19]584</sup>,将人们的思想,控制在一个极为狭小的范畴之内。“欲通旁经而涉古

书”<sup>[19]584</sup>，则被视作歪门邪道，遭父兄训斥。缘利禄诱引之故，谁还有心思刻苦读书？所涉猎“不过于《四书》、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，窃取他人之文记之，入场之日，抄誊一过，便可侥幸中式，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。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”<sup>[19]589</sup>，所造成的恶果可想而知。

“天下士子竞怀侥幸，不务实学”<sup>[19]577</sup>，这自然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不满。他们不无愤慨地感叹：“学问由此而衰，心术由此而坏。”<sup>[19]589</sup>在不少人看来，“学术坏而风俗随之。其弊也，至于荡轶礼法，蔑视伦常。天下之人，恣睢横肆，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，而百病交作”（陆陇其：《学术辨上》）<sup>[20]469</sup>。并由此推论：“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，不亡于朋党，而亡于学术！学术之坏，所以酿成寇盗、朋党之祸也。”（陆陇其：《学术辨上》）<sup>[20]469</sup>思想家纷纷欲起而改变这一现状，直接从孔、孟经典著作中寻取思想武器，以救“末学之弊”，努力做到踵迹前贤、践行仁义，而不能灭裂大道，使学、行脱节。此是其一。

其次，思想界纷争时起，莫衷一是，学术发展亟须寻找新的出路。明清之交，随着市民阶层追求个性解放思潮的崛起，王学左派思想的迅即扩展，使程、朱之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“斥朱以附王”者有之，“攻王以卫朱”者亦不乏见，纷纷角异，以致肆口谩骂，互相攻击。一些鼓吹禅学者，也“依托阳明”，乘势而起，人人引经据典、振振有词，四处讲学，指画东西，局面有些嘈杂而混乱，故有人感叹：“天下无讲学之人，此世道之衰；天下皆讲学之人，亦世道之衰也。”（陆世仪《思辨录辑要》）<sup>[20]146</sup>为了压倒对方，“于是乎逐事物，溯源流，求同异，解愈繁而经愈晦”（邵廷采：《答蠡吾李恕谷书》）<sup>[20]127</sup>。“为词章，为训诂，为功名，为禅玄，种种不一，而‘学’之一字，败坏分歧极矣。且不特异学一途有以坏正学，即正学一途，又有无限分争树帜，阳顺阴违，为正学之蠹者。‘学’之一字，至今日而遂不可复问。举世读圣贤书，不知圣贤之学为何物矣！”（陆世仪《思辨录辑要》）<sup>[20]146</sup>。

为学“止于诵读训诂”（邵廷采：《答蠡吾李恕谷书》）<sup>[20]127</sup>。尽管“《六经》之学，非训诂不明”，然而，“有训诂不能无异同，有异同不能无踳驳，他经皆然”（朱鹤龄《尚书埤传序》）<sup>[20]338</sup>。古经书如《尚书》“洪范”之类，本已难懂，“九数相乘，迷如辨雾，此以攻经书章句，犹隔重山”（朱鹤龄《尚书埤传序》）<sup>[20]339</sup>。若诠释有误，后学尽管“白首穷

经，仍讷踵陋读”（朱鹤龄《尚书埤传序》）<sup>[20]339</sup>，“义解一讹”（朱鹤龄《尚书埤传序》）<sup>[20]338</sup>，贻害非浅。何况有的训诂，是“以臆测度，趋入荒唐，堕二氏之郭郭而不自知”（王夫之《中庸衍》）<sup>[20]376</sup>。“窃佛老之土苴，以相附会，则害愈烈，而人心之坏，世道之否，莫不由之矣”（王夫之《中庸衍》）<sup>[20]376</sup>。他们往往不在读原典上下功夫，而是“厌故喜新，作聪明以乱之，弃雅训而登俗论，援叔世以证先古，为说弥巧，与经益离源也”（陈启源《毛诗稽古编叙例》）<sup>[20]357-358</sup>。“字训既伪，篇旨或因以舛”（陈启源《毛诗稽古编叙例》）<sup>[20]358</sup>。即使影响颇大的前贤训诂，亦不可盲从，“郑康成以《三礼》之学笺《诗》，或牵经以配《序》，或泥《序》以传经，或赘词曲说，以增乎经与《序》所未有，支离胶固，举诗人言前之指，言外之意，而尽汨乱之。孔仲达《疏》义，又依回两家，无以辨其得失”（朱鹤龄《毛诗通义序》）<sup>[20]342</sup>。即使程门诸子，也往往“背其师说，而淫于佛老”（王夫之《中庸衍》）<sup>[20]375</sup>。朱熹“学宗程氏”，在对《易》经的诠释方面，却“尽废王弼以来引伸之理，而专言象占”，亦与“孔子《系传》穷理尽性之言显相抵牾”（王夫之《周易内传发例》）<sup>[20]383</sup>。由王弼而至程子，是“矫正而过正”，而由程至朱，则属于“矫正而枉”，皆未得先圣思想之精髓。如此看来，“参伍众说，寻流溯源，推求古经本旨，以挽其弊”（陈启源《毛诗稽古编叙例》）<sup>[20]358</sup>，就显得特别重要。“求真解”之说的提出，是以此为背景依据的。

三是学风浮躁，辄相模仿，而不能相互发明，激使学人“寻流溯源，推求古经本旨”，以“真解”廓清“异说”。自中晚明以来，讲学风气甚盛，派别林立，各竖旗帜，分占山头，不相上下。双方互为激荡、摩擦，使得思想界呈现出空前的活跃，也催生出许多骇人听闻的思想、观点，一定程度地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冷寂局面。对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，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。但从另一层面讲，有些读书人，或将经书研习视作钓取利禄之具，“士大夫习其业者，非孔孟之书不观，非程朱之说不用，国无异学，学无他师，真所谓一道德以同风俗者矣。然学者自就傅而后，粗涉章句，即从事于应举之文，父师所讲授，无过庸软馥馥之词，得其形似，便可以致功名，转不如诗赋策论之难工。由是六经诸史，束之高阁，即四书之义，亦可勿深求，譬犹苾刍诵经礼忏，志在乞食，而不在修行”（钱大昕《处士陈先生墓表》）<sup>[21]1774</sup>。讲学之士，不少则

以意气相高,为打口水仗而疲于奔命,动辄侈言“心性”,无暇沉潜学术。正如顾炎武所说:今之君子,“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,譬诸草木,区以别矣,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。舍多学而识,以求一贯之方,置四海之困穷不言,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。”(顾炎武《与友人论学书》)<sup>[20]311</sup>这些人看上去似满腹经纶,其实大多“茫乎不得其解”(顾炎武《与友人论学书》)<sup>[20]311</sup>。即使那些以理学相标榜者,也不过是坠入“禅学”外道。他们“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,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。又曰:‘论语,圣人之语录也。’舍圣人之语录,而从事于后儒,此之谓不知本矣”<sup>[22]卷3</sup>。并直斥当代学人,为学“必求诸语录”,“今之语录,几于充栋矣,而淫于禅学者实多,然其说盖出于程门”(顾炎武《下学指南序》)<sup>[20]309</sup>。其结果则是“以明心见性之空言,代修己治人之实学。股肱惰而万事荒,爪牙亡而四国乱,神州荡覆,宗社丘墟”<sup>[19]240</sup>。《明史·儒林传》也曾对这一现象有过精辟的概括,谓:

嘉、隆而后,笃信程、朱,不迂异说者,无复几人矣。要之,有明诸儒,衍伊、雒之绪言,探性命之奥旨,锱铢或爽,遂启岐趋,袭谬承讹,指归弥远。至专门经训授受源流,则二百七十余年间,未闻以此名家者。经学非汉、唐之精专,性理袭宋、元之糟粕,论者谓科举盛而儒术微,殆其然乎。<sup>[15]7222</sup>

既然经学研究远逊于汉、唐之“精专”,“性理”之研讨,又是承袭“宋、元之糟粕”,“经训授受源流”又无意涉猎,其著述自然难以自具面目,在理论创新上打了折扣,难怪有人慨叹:

凡作书者,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。班孟坚之改《史记》,必不如《史记》也。宋景文之改《旧唐书》,必不如《旧唐书》也。朱子之改《通鉴》,必不如《通鉴》也。至于今代,而著书之人,几满天下,则有盗前人之书而为自作者矣。故得明人书百卷,不若得宋人书一卷也。(顾炎武《钞书自序》)<sup>[20]310</sup>

称“凡今人之学,必不及古人”“今人所见之书之博,必不及古人”(顾炎武《钞书自序》)<sup>[20]310</sup>,虽出语有些偏激,但毕竟道出学者改窜前人之书而冒充己作之积弊,当头棒喝,令人警醒。再说,“心性”之类,孔夫子很少述及,当今学人却喋喋不休,终日挂在唇吻之间;而出处大节、处世方略、应接礼仪、利禄取舍等最能体现一个人道德品质高下

的关键节点,孔夫子常常述及,今人反而弃之不讲,这不是空言诳骗又是什么?所以,顾炎武强调,“士而不先言耻,则为无本之人;非好古而多闻,则为空虚之学。以无本之人,而讲空虚之学,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!”(顾炎武《与友人论学书》)<sup>[20]312</sup>基于此,他积极倡导学人应“采铜于山”,“事关民生国命者,必穷源溯本,讨论其所以然”(潘耒《日知录序》)<sup>[20]331</sup>。“有一疑义,反复参考,必归于至当。有一独见,援古证今,必畅其说而后止”(潘耒《日知录序》)<sup>[20]331</sup>。“凡经义史学,官方吏治,财赋典礼,舆地艺文之属,一一疏通其源流,考正其谬误”(潘耒《日知录序》)<sup>[20]331</sup>,以资用于当下。如此看来,“穷源溯本”,以求“真解”,乃是当时问学之趋向。“求真解”之说,看起来是游戏之笔,其实,它却透露出明清之际问学之风貌,箇中大有意味可供咀嚼。

### 三、“气”与“造化小儿”——现实人生的困惑

在《后西游记》中,虚构出一阴阳二气山。“阳山上有个阳大王,为人甚是春风和气。阴山上有个阴大王,为人最是冷落无情。他二人每和一处,在天地间游行。若遇着他喜时,便能生人;撞着他怒时,便能杀人。”<sup>[9]316</sup>“气”的概念,起源甚早,甲骨文、金文即有此字。较早述及阴、阳二气的,当为《国语》,中谓:“夫天地之气,不失其序;若过其序,民乱之也。阳伏而不能出,阴迫而不能蒸,于是有地震。今三川实震,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。阳失而在阴,川源必塞;源塞,国必亡。”<sup>[23]7</sup>是说天地阴阳之气按照一定的规律在运行,若秩序有失,则天下大乱,阳气被掩盖而不能散发,阴气受阻而不能蒸发,就会发生地震。阴阳二气互依互存、相互作用。至后世思想家如张载、程颐、程颢、朱熹、许衡等人,更经常论及阴、阳二气这一哲学命题。尤其是生活于明末清初的王夫之,继承了前贤的朴素辩证法思想,认为世间万物,皆是由气而化生,“天地之化,人物之生,皆具阴阳二气”<sup>[24]卷1</sup>、“二气之动,交感而生,凝滞而成物我之万象”<sup>[24]卷1</sup>。《后西游记》将阴、阳二气具象化为占据阴、阳二山的阴、阳二大王,并赋予其人格化,这自然是情节构筑的需要,但也映射出思想家的论争在作者内心深处所留下的抹之不去的印痕。最起码说明,小说作者对这一学术背景是比较熟悉的,或亲聆讲学家之高论,或师从某派哲人,则是

很可能的。作品所写小行者将阴、阳二气山泽凿通，“致使二气混为一气，寒不成寒，热不成热”，“阴阳无准，祸福皆差”<sup>[9]341</sup>，亦是与古人对气运行规律的认识是一脉相通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还塑造出一个与“气”相关的“造化小儿”。此儿“有百般圈套，惯会弄人”<sup>[9]341</sup>，即所谓“名圈、利圈、富圈、贵圈、贪圈、嗔圈、痴圈、爱圈、酒圈、色圈、财圈、气圈，还有妄想圈、骄傲圈、好胜圈、昧心圈，种种圈儿，一时也说不出来”<sup>[9]344</sup>。“圈儿节目虽小，却一时跳不出”<sup>[9]344</sup>。其圈儿“当头罩下，受闷气不啻蒸笼；失足其中，被拘挛浑如铁桶。非千仞高墙，孰敢逾而出去；仅一层薄壁，谁能凿而偷光。虽木不囊头，只觉头上无路；纵縲非械足，也如画地为牢”<sup>[9]345</sup>。小行者变化多端，武艺高强，“酒色财气无侵，贪嗔痴爱不染”<sup>[9]347</sup>，故起初造化小儿圈他不住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跳来跳去，出入自由。但因其争强好胜心切，终究被其套住，“跳进跳出，跳得满身是水”<sup>[9]349</sup>，仍难以脱身，后为李老君所救，始得以摆脱“圈”之束缚。当小行者不得其解，向李老君求教时，老君径称：“造化小儿那有甚么圈儿套你？都是你自家的圈儿自套自。”<sup>[9]349</sup>并进一步解释说：

圈儿虽是他的，被套的却不是他。他把名利圈套你，你不是名利之人，自然套你不住；他把酒、色、财、气圈儿套你，你无酒、色、财、气之累，自然轻轻跳出；他把贪、嗔、痴、爱圈儿套你，你无贪、嗔、痴、爱之心，所以一跳即出。如今这个圈儿我仔细看来，却是个好胜圈儿，你这泼猴子拿着铁棒，上不知有天，下不知有地，自道是个人物，一味好胜。今套入这个好胜圈儿，真是如胶似漆，莫说你会跳，就跳遍了三十天也不能跳出。不是你自套，却是那个套你？<sup>[9]349-350</sup>

小行者至此始明白，“我只道好胜人方能胜于人，今未必胜于人，转受此好胜之累”<sup>[9]350</sup>。

这一近乎寓言的故事，所透现的乃是生当明清之际的读书人对现实人生的感喟与困惑。作品第二十九回，借助沙弥之口说：“我听人说，文武百官，俱称皇帝是主公。难道文武百官，都是奴才？”<sup>[9]334</sup>所影射的乃是清代之事。鲁迅在《隔膜》一文中曾谓：“满洲人自己，就严分着主奴，大臣奏事，必称‘奴才’，而汉人却称‘臣’就好。这并非因为是‘炎黄之胄’，特地优待，锡以嘉名的，其实是

所以别于满人的‘奴才’，其地位还下于‘奴才’数等。”<sup>[25]33</sup>从龙勋旧、满清贵族，在皇上面前才能以“奴才”自称，而称皇上为“主子”。据《清代文字狱档》，如贵州巡抚开泰，就自称“满洲奴才”<sup>[26]725</sup>。布政使温福、户部侍郎兆惠等，亦以奴才自称。至于所起用的汉人，则只有称“臣”的份，其地位的确“下于‘奴才’数等”。所谓“文武百官，都是奴才”之议论，显然是有感而发，意有所指，是汉族读书人不满于视臣下为奴才这一现状才抒发感慨的。

明清之交，历史上称之为“天崩地解”的时代。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之后，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打、拉并用的两手政策，一方面频抛橄榄枝，每以功名利禄相引诱；另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，文士著述中稍有违碍字句，则斥为“肆口游谈，倒置是非，语多狂悖，逞一时之私见，为不经之乱道”<sup>[26]952</sup>，进而大加挞伐，甚或刀斧相加，且株连多人。在当时，种种利害关系相纠葛，不能不影响读书人之心志。清人陈瑚（1613—1675，字言夏，号确庵，又号无闷道人、七十二泽渔父，江苏太仓人）《得全堂夜燕后记》，记述与诸友观赏汤显祖《邯郸梦》一剧之演出，而后感叹道：

诸君子知临川先生作此之意乎？临川当朝廷苟安之运、值执政揽权之时，一时士大夫皆好功名、嗜富贵如青蝇、如鸷鸟，汲汲营营，与邯郸生何异？其作此也，义形于外，情发于中，冀欲改末俗之颓风、消斯人之鄙吝，一歌之中，三致意焉。呜呼，临川意念辽矣！岂惟临川，古之人皆然。鶡首之剪、翟犬之赐，亦当时君子瞻念宗周，兴怀故国。怪夫强暴如秦，何以一天下；悖逆如赵，何以享晋国。涕之无从，不得已而呼天，笑曰：此必醉天为之，此必梦天为之。史臣不察，载之册简，后人信之，遂为美谈。千百年仁人志士之苦心，湮灭尽矣。甚至借昔人之寓言，助二氏梦幻、泡影之说，将使天地间有形有迹之物、大丈夫远大之任，一切付之云飞烟散、酒阑梦觉间。呜呼，有是理耶？<sup>[27]67</sup>

“千百年仁人志士之苦心，湮灭尽矣”，所反映的恰是当时人们之心态。

无独有偶，远在安徽望江的龙燮，目睹家乡“恒产日贱，比屋多贫，往往殫地竭庐不能为输供计，而又重之以十年一克之粮里，破家产、徙箸鬻子而日不给者，又数十年于此也”（龙燮《邑令吴美秀裁粮里杂派记》）<sup>[28]卷12</sup>，亦多愤然难平语。他自

幼发奋读书,欲一展怀抱,“习占毕,抱铅槩,几不知马之几足。而半生壮气,既不获吐为功名,又不尽寄于泉石,往往借读史发之,谈忠孝则扼腕兴怀,论奸谀则裂眦抵几”(龙燮《望江县原志后序》)<sup>[28]</sup>卷12,也颇多郁勃感慨之气。

南陵盛于斯,“其少事诗书时,一事不知,以为深耻,有如陶弘景;闻有异书,必往祈借,有如崔慰祖所为书淫者。时东事沓起,乃长歌烈士、击碎唾壶,不欲区区笔砚间,端坐作老博士,有如如来护儿。读书至‘击鼓其镗,踊跃用兵’,遂辍而叹,作丈夫为国灭贼以竖功名之想。既而不利,归卧湖干,家计壁立,环堵萧然,晏如也”(梁非一《休庵影语序》)<sup>[29]</sup>卷43。并在《泪史自序》中借题发挥道:“况夫古今来气化不齐,升沉异路,孤臣孽子,迁客逃奴,与夫烈妇情变以及羈囚剑客,几多饮恨,不少吞声,其欲出不得出之气,欲了不得了之情,欲完不得完之事,欲高不得高、欲低不得低之地位,欲歌不得歌、欲哭不得哭之凭吊歔歔,后人为之设身处地,凡有心男子,未有不放声长嚎痛哭流涕者。”<sup>[29]</sup>卷43藉此抒发国破家亡的遗恨。

在动荡多故的年代,人们依着个人品性、处世态度、价值观念的不同,也在当时社会的不同层面扮演着色彩各异的角色,或归隐山林,或遁入空门,或应声而出,谋取高位,或拼命抗争,终罹灾难,有着各不相同的生活遭际和难以表述的复杂心境。这期间,有饱受折磨的苦痛、道义担当的快慰,也有富贵利禄的满足、淹蹇不遇的愤慨。这就是小说所陈述的名、利、富、贵、贪、嗔、痴、爱等“圈”。“圈”是无形的,是富有寓意的,但对人的拘钳与制约,却是有迹可循的。作品之所以强调跳出种种“圈”,无疑是希望人们摆脱利、禄、名、位、财、色、爱、贪的羈绊,达到“酒色财气无侵,贪嗔痴爱不染”<sup>[9]</sup>347的率性而为、自由自在的境界。李老君劝小行者自我解套的一番话语,无疑是给深陷其中者一剂自我解脱之良方。如此看来,“跳圈”云云,盖有所指。

#### [ 参 考 文 献 ]

- [1] 刘晓廉. 心路历程:《后西游记》的根本寓意[J]. 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, 2002(6).  
[2] 刘廷玑. 在园杂志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5.  
[3] 李洵等校点. 钦定八旗通志(第七册)[M]. 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2002.  
[4] 张慧剑. 明清江苏文人年表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

- 版社, 2008.  
[5] 明清小说论丛(第一辑)[M].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1984.  
[6] 孙楷第.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82.  
[7] 戴不凡. 小说见闻录[M]. 杭州: 浙江人民出版社, 1980.  
[8] 杨廷福、杨同甫编. 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(增补本)下册[M].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1.  
[9] 天花才子点评. 后西游记[M].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1981.  
[10] 戴逸、李文海主编. 清通鉴(第三册)[M]. 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1999.  
[11] 印鸾章编. 清鉴(上册)[M]. 上海: 上海书店, 1985.  
[12] 卢前. 卢前曲学四种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6.  
[13] 袁栋. 书隐丛说. 清乾隆刻本.  
[14] 苏天爵. 滋溪文稿(卷五)“序一”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7.  
[15] 张廷玉. 明史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74.  
[16] 赵兴勤. 理学思潮与世情小说[M].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2010.  
[17] 薛瑄. 读书录(卷一)[M].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.  
[18] 朱彝尊. 曝书亭集(卷三五)序二·道传录序[M].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.  
[19] 顾炎武撰、黄汝成集释. 日知录集释[M]. 长沙: 岳麓书社, 1994.  
[20] 徐世昌等编纂. 清儒学案(第一册)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2008.  
[21] 黄人等编. 清文汇(中册)[M]. 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1996.  
[22] 顾炎武. 亭林文集(卷三)与施愚山书. 亭林诗文集[M]. 四部丛刊本.  
[23] 左丘明. 国语(卷一)“伯阳父论周将亡”[M]. 长沙: 岳麓书社, 1988.  
[24] 王夫之. 张子正蒙注(卷一)[M]. 清《船山遗书》本.  
[25] 鲁迅. 且介亭杂文[M].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1973.  
[26] 上海书店出版社编. 清代文字狱档(增订本)[M]. 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1.  
[27] 赵兴勤、赵鞅编. 清代散见戏曲史料汇编(诗词卷·二编)上册[M]. 台北: 花木兰文化出版社, 2015.  
[28] 康熙安庆府望江县志(卷一二)[M]. 清康熙刻增修本.  
[29] 余谊密. 民国南陵县志(卷四三)[M]. 民国铅印本.

(责任编辑 南山)